

中央苏区时期的互济会

余永和

史事经纬

互济会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前身为1925年10月25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济难会，1929年12月27日易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简称“互济会”）。随着工农革命的蓬勃发展，各苏区相继建立了互济会。1933年4月12日，中央苏区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中央苏区革命互济会章程》。中央苏区时期各级互济会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开展扩红、劳军、救助与生产等活动，为苏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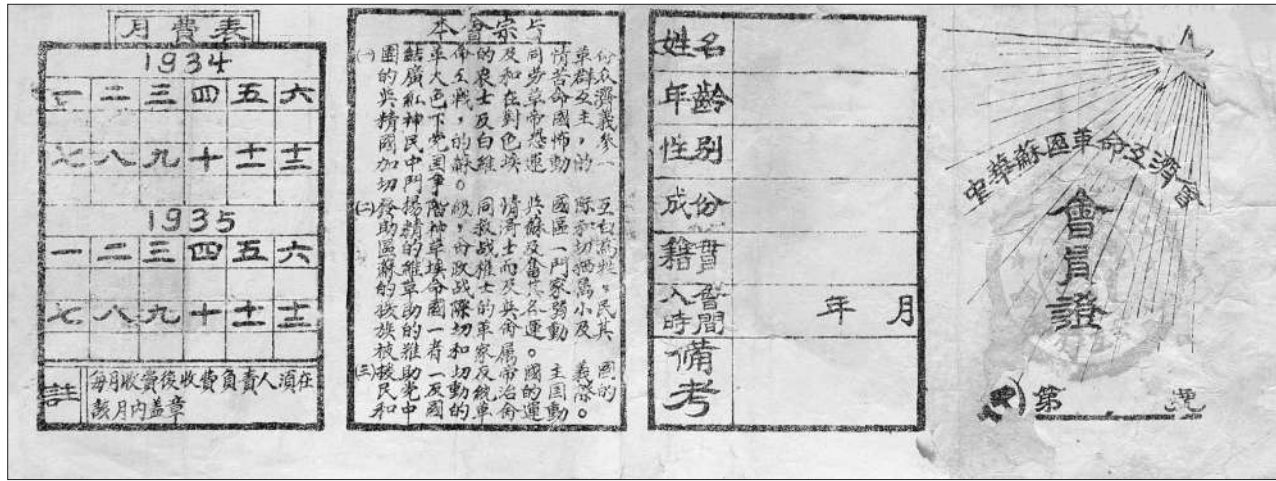
开展扩红工作

1932年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训令，要求互济会等群众团体协助开展扩红工作。10月7日，上杭县城郊区定达乡苏维埃为执行扩红训令，在田背村列宁小学举办游艺晚会，请县互济会代表作了动员报告，当场就有15名群众报名参加参军。1933年4月，西江县黄安区坡下乡互济会主任在召开会员大会时，率先报名参加，带动14名会员一同报名；庄埠区盘坑乡互济会几天内就动员48名会员和13名群众加入红军，成为扩红运动的模范。在福建省互济会领导下，永定县群众有90多人加入红军。上杭县互济会在红五月期间动员了345人入伍，于都县互济会在“五卅”纪念日动员了682名会员参军。中央苏区互济会为纪念南昌起义，要求各地互济会发动会员群众整营整连加入红军，很多县互济会组建了反白色恐怖连或排。12月1日至10日，在江西省互济会等群众团体的鼓励下，3万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互济会优待红军家属，解除青壮年参军的后顾之忧。如1933年8月1日前夕，互济会发动会员群众帮助红军家属进行秋收秋耕，提议政府检查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执行情况，举行红军家属联欢会。1934年1月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联合颁布《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要求各级党部领导互济会等群众团体优待红军家属。

慰劳红军指战员

1932年5月，福建省互济会根据福州代表“慰劳红军”的提议，在会员群众中募集400余元，其中300元用于援助福州被难革命战士，100元用于慰劳伤病红军。两个月后，福建省互济会携带慰劳品，到军团医院慰劳伤病红军；1933年3月，江西省互济会颁布大规模慰劳红军的通告，



▲互济会会员证

瑞金县互济会立即组织慰劳队，携带5000余双草鞋和500元大洋奔赴前线；4月，福建省互济会号召会员做布草鞋慰劳红军，长汀县濯田区王胜英一人就做了40双；5月，上杭县互济会慰劳红军达10次，募集了5000双草鞋；11月，万泰县互济会动员群众组织慰劳团，携带肉食、蔬菜及书信慰劳伤残战士；1934年5月，瑞金县互济会与县工会、各区主任召开联席会议，掀起慰劳新战士的热潮；宁化县互济会鼓动会员群众携带现金、草鞋、菜干和薯干慰劳红军及其家属……

互济会还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慰劳红军的行动。如中央总部号召每个队员做一双草鞋与一双套鞋，总执行局号召工人做30000双草鞋，由互济会转交前线红军战士。福建军区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响应互济会的号召，举行募捐活动，筹集慰劳红军的钱款。福建省邮务工会一个月节省伙食费250余元，连同募集的草帽、口筒、布草鞋与斗笠等都交给省互济会，用于慰劳红军。

1934年5月，中央机关制订《收集和分配慰劳品的办法》，指定各级互济会为收集慰劳品的机构，各区互济会将收集的慰劳品送至县互济会，再由县互济会转交军委总供给部指定的接受机关。总供给部指定各县慰劳品暂时集中地点，由各军区供给部、政治部、动员武装部以及省或县工会、互济会各派1名代表组成接收保管委员会。

纾解苏区财政压力

为克服因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带来的财政问题，苏区互济会动员会员及群众认购公债、出借粮食及开展节约运动。

首先是认购公债。1932年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训令，要求各级政府依靠互济会等群众团体的帮助，限期推销60万元公债。1933年9月10日，中央机关党总支部开展推销经济建设公债的竞赛，互济会表现最佳，推销公债超过原定数额的1倍。兴国县杰村区在互济会等群众团体的努力下，成为推销公债的模范区。互济会还倡议将认购的公债连本带息退还给政府。长汀县红坊区涂坊

乡互济会会员退还16元公债票，水尾乡互济会会员退还2元；武平县互济会会员退还101元。苏区互济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呼吁退还80万元的二期公债票，瑞金县互济会立即召开各区主任联席会，动员会员群众退还公债票，与会人员当场退还14元，全县共退还3350余元。1933年红五月中，胜利县互济会会员退还602元，上杭县互济会会员退还6100元。

第二是出借粮食。1933至1934年，中央苏区开展了3次借谷运动。由于互济会等群众团体的广泛动员，苏区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完成了政府的借谷任务。宁化县不口区官坑乡互济会等群众团体曾联合乡苏维埃要求尽快颁布借谷条例，以呼应群众高涨的借谷热情。与退还公债票一样，互济会也号召群众退回谷票。上杭县互济会在红五月退还逾千张谷票，瑞金县壬田区互济会在“五卅”纪念日退还410石的谷票。

第三是开展节约运动。1933年9月，红军学校互济会在反法西斯运动周中节省49石谷子。1934年3月，苏区互济会工作人员纷纷自带伙食，以节省办公开支。

救助受难工农群众

当时，白区工农群众遭受白色恐怖与自然灾难的摧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苏区互济会发扬阶级互助精神，尽力救助白区受难群众。

互济会积极救济白区受难农民。1933年6月至7月，很多白区遭遇洪灾，苏区互济会发起募捐活动。上杭县边区乡民遭到白军蹂躏，县互济会募集约1000元救济金。互济会还帮助群众建立合作社，开展互助运动。如永丰县建立粮食合作社，因群众认购后“无钱无谷集股”，就先由互济会借出部分现金，待秋收后再让群众交谷入股。兴国县互济会等群众团体经过大力宣传，动员群众加入劳动互助社与粮食合作社。

互济会还发动难民恢复生产。会昌县互济会召集各机关联席会，领导被难群众参加斗争和生产。公路县与龙岩县被难群众逃到苏区，除参加红军和机关工作外，其余劳动力主动加入垦荒队伍。公路县互济会还借出100石谷子，帮助难民度过春荒。瑞

金县互济会组织难民耕田队，弥补秋收劳动力的不足。

互济会还热情援助白区受难工人。1933年，上海正泰橡胶厂与永和橡胶厂相继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苏区互济会及时伸出援手。如红军互济会募集800余元，红军学校互济会捐助100吊钱，后方政治部干部训练队员捐出所有余钱，用于援助上海受难工人。

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区互济会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积极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战和上海反日罢工工人的斗争。

中央苏区互济会成立时就号召募捐3万元援助东北义勇军。1933年5月，瑞金县壬田区禾丰乡互济会代表报告了东北义勇军的抗日事迹，群众当场捐助500余元大洋；黄柏区蓝田乡在马克思诞辰纪念会上募集98元。赣县山溪区互济会代表在“五卅”纪念大会上报告了东北义勇军的斗争情形，在场群众争相捐款。上杭县互济会在红五月中捐助大洋四百元，党校互济会等组织在大会现场捐助11元8角，退还公债票10元8角，全部寄给东北义勇军。福建军区一分院互济会募集大洋164元8角，各方面互济会也募集了不少款项，如一军团137元，三军团近156元，各兵站77元，方面军直属队210元。

苏区互济会多次为上海反日罢工工人募捐。中央工作人员互济会与中央印刷局互济会分别募集39元、四都医院互济会募集43元。红军大学本部伙食单位将所存的伙食节余款大洋38元7角，加上募集的大洋3元2角，全部交给互济会，用于捐助上海工人。福建省互济会号召会员群众捐助上海工人，其中龙岩县捐助288元，上杭县捐助179元。

红军长征胜利后，互济会继续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活动。1937年10月，抗敌互济会在延安成立，附设在边区民政厅。1940年11月，抗敌互济会被并入边区民政厅二科，但对外仍保留了互济会的名义。1941年12月，边区民政厅五个科裁并为四个科，由第三科负责救灾救济工作，正式取消了抗敌互济会。互济会光荣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红色足迹

“惠生堤”的由来

常红

1942年7月，在中共皖中区委领导下，皖中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皖中行政公署，吕惠生任行署主任兼皖江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

吕惠生上任后，作为皖中根据地的行政首长，不仅着力于组织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并领导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还大力兴办工厂，积极发展商业贸易，不但保证了当地新四军第七师驻军的军需供应，更向苏北新四军军部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他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结交了大批当地爱国民主人士，和他们共商抗日和建设大计；为鼓励生产和改善民生，他认真执行减租减息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深受群众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泥腿子专员”。

1943年2月，皖中根据地中心区周边几县发生春荒。吕惠生一面采取各项措施，帮助群众度过春荒，一面积极筹划“大力兴修水利，彻底改变皖江圩田旱易涝状况”的方案。

在经过反复思考论证和调查研究，并取得区党委同意后，4月21日，吕惠生主持召开行署财经工作紧急会议，把兴修水利、根治水患摆上议事日程。会议决定：除重建无为县境内3闸工程，开辟泥泥岗河道，开凿湖东的大新圩山河之外，立即展开位于无为县东乡的黄丝滩江堤重建工程的建设。

6月，吕惠生亲自率行署水利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赴现场勘察，提出了“少压农

田、避开险段、直线走向”的基本方案，并就地草拟了黄丝滩重建工程计划，确立了施工基线。

7月，皖中行署成立皖中水利委员会，负责统筹根据地的水利建设，吕惠生兼任水利委员会主任。当月25日，吕惠生在皖江第一届议会代表会议上，就黄丝滩重建工程提出“自三支笔到孙家土地庙为施工最佳路线”的建议，被代表会议采纳、批准。

黄丝滩江堤重建工程开工后，为了建好这一工程，吕惠生亲临现场勘查，选定最佳方案，精心制订规划，悉心组织施工。施工中，他亲自参与测绘，设计图纸，与民工一起挖土、挑担、打夯。在吕惠生率领下，21万（人次）民工，一面冒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一面抵御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奋战211天，填埋沿堤大小沟塘30多处，完成土方40.4万立方米，终于筑成一条长12千米，“底宽约十二丈，顶宽二丈四尺，高二丈”的沿江大堤。据当时黄丝滩工程局的工程竣工报告：“此次建后，新堤（走向）已几乎与江水（流向）平行，堤身不再受江水冲击。新堤较以往任何一次筑堤都坚实。”1944年5月6日，皖中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各界代表召开了隆重的黄丝滩重建新堤落成典礼。

这条大堤的建成，使皖中300余万人民和400万亩农田免遭水患。为了表彰吕惠生在这一工程中的杰出贡献，根据地的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将新建的黄丝滩江堤命名为“惠生堤”。

冀中十八团智夺敌据点

金阁

1942年3月，华北日军调集兵力，分多路对八路军冀中军区九分区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遭到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抵抗。8日，正在进行“扫荡”的日伪军一路300余人占领了安国县石佛镇，并在镇内修筑据点，企图以此为基地，继续向抗日根据地腹地进犯。为了给予敌人以迎头痛击，冀中军区九分区领导研究决定：派冀中十八团会同安国县地方武装攻打石佛据点。

为了攻克石佛镇据点，冀中十八团派二营四连秘密进驻石佛镇的东面、南面附近的村庄，侦察敌人工事的修建情况，掌握敌情变化，并联合当地民兵打击外出抓壮丁的敌人。4月4日，十八团四连伏击了外出抓夫的伪军，毙敌十余人，俘虏1人。通过对俘虏的审讯，十八团掌握了据点内的兵力布置和火力配备情况。

6日上午，十八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周密部署了战斗任务。6日晚9时，参战各连队悄无声息地进入了预定阵地。战斗于午夜打响后，突击队很快扫清了镇外敌人工事，并向日伪军据点发起了猛烈进攻。敌人仗仗沟深墙高和火力优势拼命顽抗，战斗异常激烈。十八团突击队发起三次强攻，均未突破敌人的院墙。团部立即下令停止攻势，经研究，决定变强攻为智取。

7日凌晨1时后，守在据点院墙上的日伪军听到八路军先是用手电筒“频繁联络”，接着又听到不少人“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又发现一些手电筒射出了光柱和点亮的烟火火光随同脚步声在黑暗中逐渐远去。日伪军向八路军阵地开枪，并接连发射照明弹，没有发现八路军的任何踪迹，一个小时后，敌指挥官判断八路军“已然全部撤走”，于是命令除留几个伪军充当哨兵外，其余敌人都回营房休息。

见敌人中计，十八团指战员于凌晨2时左右悄悄摸到据点院墙下。2时10分，十八团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消灭了敌人岗哨，并封锁了敌人的各处枪眼；接着，战士们将集束手榴弹一齐投入院内，把酣睡中的日伪军炸得哭爹喊娘。在火力掩护下，突击队战士们迅速架起云梯，攻入院内，将敌人封锁在营房里。日军企图抵抗，被十八团战士击毙，伪军见状，纷纷缴械投降。

此次战斗，十八团共击毙日军20多人，俘虏伪军25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200余支，一举拔除了敌人设在石佛镇的据点。战后，各路“扫荡”中的敌人仓皇撤出九分区。

新四军取得靖新公路大捷

吕勃东

1941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为了适应新的抗日斗争形势，成立苏中军区，受新四军和中共苏中区委双重领导。新四军苏中军区成立后，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在反“扫荡”、反“清乡”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43年春，靖江地区敌我斗争形势十分严峻。4月4日，汪伪暂编第十九师占领靖西后，伪师长蔡鑫元垂涎靖江县警察局局长陶明德在新港、八圩港口等地的巨额税收，多次企图将陶明德收入其麾下，遭到陶明德的拒绝。1943年4月上旬，蔡鑫元借口“靖东地区有新四军”，派七十三团和师部特务营占领了新港。伪十九师占领新港，对苏中抗日根据地从新港运进物资以及秘密人员的往来造成很大影响。根据情报，伪十九师驻新港部队准备于当月15日西返途中控制靖江县城，将整个靖江纳入其势力范围。中共靖江县委及时将这一情况向苏中三地和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进行了汇报。

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兼旅旅长叶飞（同时兼苏中三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对此十分重视，立即与军分区司令员陈玉生、副司令员张藩等人研究，决定充分利用这两股伪军争夺地盘之间的矛盾，狠狠打击伪十九师。

随后，叶飞来到靖江，召开靖江、如皋、泰兴、泰县4县独立团负责人联席会

议。会议对战斗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明确整个战斗由张藩指挥。会议结束后，中共靖江县委派人前往靖江县城，通过内线将伪十九师准备袭取靖江县城的消息告诉了陶明德，并要求陶明德在新四军战斗打响消灭伪十九师的战斗后做到“不得出援伪十九师”，陶明德满口答应。

4月14日夜，靖、如、泰、泰4县独立团和苏中第三军分区特务营在张藩指挥下，于靖（江）新（港）公路的药师庵地段设下伏击圈。

15日晨，伪十九师驻新港部队自新港沿靖新公路向靖城开进。当敌人进至7号桥至5号桥地段时，新四军各伏击部队突然从四面八方冲上公路，与敌人展开激战。伪军除被当场击毙外，大部分枪还背在身上，就做了俘虏。走在后面的部分伪军扔下辐重，拼死突出重围，逃向附近陶明德的据点，但据点里的伪军却借口“防止新四军乘机冲进据点”，将他们拒之门外。无奈之下，残敌只得继续落荒而逃，途中被新四军消灭。

整个战斗，仅几十分钟就胜利结束。此战，新四军全歼伪十九师七十三团和特务营，毙伤300余人，俘虏团副、营长以下450余人，一举扭转了整个靖江地区的斗争形势。

上海解放前夕铁路工人的护厂、护路斗争

陈宇

史海观澜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带领9000余名党员、10万余保安队和宣传队员按计划坚守岗位，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部队。人民保安队遍布上海市区大街小巷，有的给解放军当向导，有的协助解放军抓俘虏，更多的则是开展护厂、护校、护店等活动，力争把上海完整地保留下来。

当时，国民党军统局派出技术总队的特务，企图炸毁上海火车站及相关设施，工人们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务来到铁路修厂，强迫工人们把20辆道车改装为装甲车，企图把这些改造车辆塞满炸药，开到火车站站台上引爆。

修厂厂长陈孟涛、工程师任昌升（中共地下党员）和电焊工长丁炳

根带领工人们采取损坏工具、故意找不到材料等办法，尽量拖延，并故意将熟铁板和生铁板焊在一起，这样，焊成一整块的铁甲板刚刚立起向车上装，突然就散了架，只好又抬下重新焊接。就这样，直到国民党军宣布逃离上海，特务们连一辆“装甲车”的模样也没有看到。特务们又企图化装成修厂工人，将炸药偷偷搬进火车站，但在火车站工人纠察队的日夜防范下，这个阴谋也没有得逞。

与此同时，在上海市铁路的其他部门，工人们与国民党军、警、特的斗争也在紧张地开展着。铁路地下党支部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把分布在上海市区的各个铁路单位，划分为路局机关、上海站、龙头房等8个区，特别挑选任命了各区区长。要求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职工联合会会员严守地下工作纪律，团结广大员工制止敌人破坏铁路的阴谋，保证上海解放后，铁路能立刻恢复通车。

当时，不少国民党军用于逃跑的

铁路已被工人们破坏。国民党上海当局为了恢复国民党军在逃跑时的退路，派出100多名国民党军警开进机务段，威逼工厂主任开出救援车，抢修蕴藻浜铁路桥。当这位主任正要指挥工人搬运修理工具时，忽觉得有人在他口袋中塞了东西，他掏出一看，是一张写着“不要为敌人卖命”的字条，于是他借口找司机，跑出了机务段，到亲戚家躲藏起来。工人们借口“没有主任，救援车难以开动”，跟着哄而散，让敌人抢修蕴藻浜铁路桥的企图没有得逞。

铁路局地下党总支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向铁路局管理层发出了劝告信，要他们认清形势，为人民铁路立功。管理层人员也互相劝告，不再作逃离上海的打算。在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功地策反了铁路局代局长陈福海，这为上海铁路部门的反破坏行动从组织上提供了保证。

地下党组织指示陈福海：一、把机务段的火车头分散到郊区小站，以避